

古蜀人的“五”崇拜和宇宙观

李竞恒

【摘要】 很多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能够显示古蜀文化中，“五”这一数字具有重要的象征和宗教含义。笔者通过张光直先生“亚美文化连续圈”和美国宗教思想史学者伊利亚德等人对萨满宇宙观的研究成果，结合古蜀文化中“五”崇拜的现象，认为这一现象体现了古蜀人的宇宙观，这一观念与东亚、北亚及美洲的萨满宇宙观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古蜀人的“五”崇拜，也为“亚美文化连续圈”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关键词】 古蜀；五；十字形；宇宙观；亚美文化连续圈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3)10-0011-4

一、古蜀文化中的“五”崇拜观念

美国宗教思想史学者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在《神圣与世俗》中专门谈到了古人存在着一种对神圣范式真诚模仿的心理，这种心理能够凸现两种效应：

1、通过对诸神的模仿，人们保持仍然存在于神圣之中，因此也就生活在实在之中。

2、通过对神圣的范式性不断地再现，世界因而被神圣化。人们的宗教行为帮助维持了这个世界的神圣性^[1]。

按照伊利亚德所提供的宗教思想史范畴，要理解古代宗教思想中“神圣”与“世俗”的复杂关系，就需要密切把握“神圣”作为一种象征和范式在经验生活中不断被模仿和重现。人们需要通过在“世俗”行为中表现这些象征而获得“神圣”周期性地在场。例如，伊利亚德发现在大量远古的宗教思想中，“三”这个数字的宗教价值非常重要，它被视为宇宙分层的象征^[2]。

实际上，除了作为宇宙分层象征的“三”具有重要的宗教核心意义之外，通过对不同古代

文明的具体材料分析中，都不难获得相关信仰范式的象征表现材料和信息。

随着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对古史中“三代”王朝及史前社会的研究进展迅速，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研究已取得重要突破。除了传统旧史学叙事的中原中心地区之外，整个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突破。西南地区的古蜀文明是整个长江流域史前早期文明演进中第一个迈向早期国家的原生形态发展区域^[3]，多年来的考古材料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古蜀精神信仰材料。

早在1990年代，段渝先生就通过一系列的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发现了古蜀文明中广泛存在着对神圣数字“五”的崇拜。在郫县三道堰古城遗址“大房子”中的五座卵石台基，具有祭祀的功能，显示了“五”与神圣祭祀之间的关系。在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中发现的宗教首领形象，都戴着“五”齿高冠。不但青铜太阳轮上被表现为“五”条射线，而且石边璋上也以“五”幅图为一组，每组图案上表现“五”个人物。在更晚期的彭县竹瓦街一号、二号古蜀窖藏中出土的青铜罍，也以“五”为单位进行组合。四川新都战国蜀王木椁墓

〔作者简介〕李竞恒，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68。

的腰坑中随葬青铜器也以“五”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合。除了这些考古材料之外,传世文献也记载古蜀开明王朝前五代君王谥为五色帝,并以五色为庙主,蜀王妃为“五妇”,社会组织为“五丁”等^[4]。另一方面,《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李冰治水“以五石牛以压水精”的行为,恰恰是为了迎合古蜀人尚五的文化传统,而《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谓秦开五尺道,与“数以六为纪”的秦制不合,却合于古蜀人传统中尚五的观念,正可证明五尺道开通时间远早于秦朝,体现了古蜀人尚五的文化传统^[5]。这些材料可以组成一个历史谱系的线索,显示了在距今4000多年直至战国开明王朝晚期延绵数千年之间,古蜀人一直保持着对神圣数字“五”的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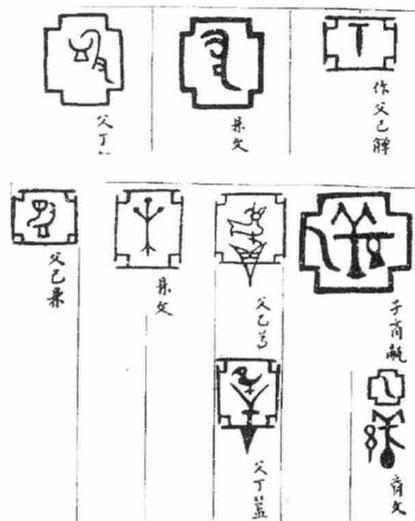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6],在古人的世界观与知识语境中,战争与祭祀构成了“神圣与世俗”的紧密互动。“神圣”的象征会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被渗入到信仰与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段渝先生的归纳,这些历时性的材料均指向神圣数字“五”,而“五”作为一种“神圣”与“世俗”之间的最高范式,将人类的生活宗教化。祭祀的宫庙中建立起“五”的卵石台基供奉诸神,三星堆青铜祭司的冠上也表现了神圣的“五”。而根据伊利亚德的研究,萨满教信仰中,萨满祭司的帽子被视为最为重要的穿戴道具,其中蕴含着萨满最重要的法力^[7]。由此不难推见,古蜀宗教观念中“五”具有怎样重要的神圣力量。此外,蜀王墓中也随葬着以“五”为单位的神器,甚至以“五色”为庙主,这些材料构成了一个“神圣”的维度。而古蜀社会中,王妃以“五”为单位,氏族血缘组织以“五丁”为征发单位,则又构成了“世俗”的维度。这样,神圣的“五”就贯穿了维系整个古蜀文明“神圣与世俗”之间的核心纽带,成为宗教思想的基本象征范式。

二、“五”崇拜与十字形宇宙观

古蜀文明中,“五”被作为最高的神圣象征范式在“神圣”与“世俗”的不同维度中都得到了表现。但通过对上古时期中原地区材料的研究却可

以发现,殷商文化中“五”这一象征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宗教含义,并且和宇宙结构之间关系密切。笔者认为,这对理解古蜀文化中的“五”崇拜具有启发意义。

在商代的宇宙图式中,作为十字形的(或称“亚字形”)这一符号具有核心的象征意义。叶舒宪先生曾经指出,在古代的神话思维中:“十字架本身亦有宇宙之中心,宇宙之主宰的神圣意义。拥有或崇拜这神秘的十字,便可确保宇宙秩序的正常运行。”^[8]这种十字形的符号与象征在商代考古的材料中有着广泛的存在。例如,商代的族徽上便广泛地用这种十字形来作为某种政治含义的表征。在《金文编》中收入了大量这样的带十字形徽号^[9],例如:



(图:《金文编》中收录的部分十字形徽号)

张光直先生曾在《说殷代的“亚形”》一文中对商代大量使用的十字形符号含义进行过分析。除了青铜器徽号之外,商王的大墓在形状上也普遍采用这种十字形的空间结构。例如,殷墟西北冈1001号大墓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制。

此外,中国古代集合了宗教与政治功能的明堂或宗庙建筑也具备着这样的结构。按照传统的说法,明堂、大寝、宗庙与燕寝都呈现为这样的十字形结构。分为中、东、南、西、北四个空间,按照王国维先生的看法,他认为这些宗教礼仪建筑在格局上都有中庭之外,“四屋相对之为古宫室之通制

矣”^[10]。不过,这样的结论还没有考古学上有力的证据。但至少能够显示,在传世文献中确实久远地保存着关于十字形作为神圣建筑的“范式”意义。

英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先生归纳认为,十字形在商代考古中的表现是三点:青铜祭器圈足上有十字形穿孔;氏族徽号和祖先名多用十字形;殷墟的墓葬用十字形营建。她根据殷代宗教宇宙图式中十字形的核心意义,推导出这一神圣范式就是“五”这一数字的观念基础,它的原义是十字形表示的对土地的地理划分^[11]。这就意味着,以十字形宇宙空间为构架背景的神圣范式推导出“五”这一数字具有了核心性质的意义。这一点,也非常符合伊利亚德对早期中国宗教思想的分析,他说道:“五个宇宙之数——四极和一个中央——中的每一个都各有一种颜色、味道、声音和特殊的符号。”^[12]

甲骨卜辞显示:

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屯南》1126)

贞: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

勿于中商(《合集》7837)

王贞:于中商乎……方(《合集》20453)

王贞:受中商年(《合集》20650)

这些甲骨文材料表明了商代人的世界观中,宇宙模型分为五块:南、西、北、东和中央的商王国,殷商王室所在的地区也被称为“中商”,是世界的中心。这种将本民族的宗教—政治中心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大量古代民族的文化中^[13]。伊利亚德指出,神庙、王城、王宫所在的区域在萨满性质的远古文化中通常被视为通天的神圣所在,也被理解为“世界的中心”^[14]。这样,一个分为五块的宇宙结构就清晰地呈现了出来。显然,“五”的崇拜心理背后,透露出的信息是宇宙结构呈现为一个分为五块的十字形。神圣的“五”,也正是神圣宇宙和宇宙中诸神的数字化象征。

在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图式中,宇宙也被按照12个月对应的诸神表现为十字形的结构,这个十字形的宇宙之中也对应着五个方位的“群神五正”^[15]。这些材料说明,以十字形宇宙模型衍生出来的神圣数字“五”所寄与的象征在先秦观念中有着久远的传承。胡厚宣先生从商代文化中对“五”的推崇这一观念分析认为,战国时代流行的五行学说之滥觞可以上溯到殷商^[16],将五行思想之滥觞追溯到商代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叶舒宪先生就认为:“五行思想的形成同五方观念确实有着难解难分的关联。”殷代的五方思想是五行思想的最早源头之一^[17]。葛兆光先生也认为:“从现在考古发现的资料看来,五行思想的来源可能要比我们现存文献中看到的要早得多。”^[18]这种观念的源头可以被上溯到商代。而这一神圣范式被他称为“数字化的世界秩序”。

由此可见,“五”的神圣性与崇拜现象并不是古蜀文化所独有,中原地区从殷商到后世的“五行”思想都与此有密切关系。“五”这一神圣数字的原型,正是十字形的宇宙和宇宙中的诸神。因此可以说,“五”的崇拜离不开十字形的宇宙观念。而十字形的宇宙观,也并非中原或古蜀所独有,而是广泛存在于整个东亚、北亚和美洲的本土宗教文化中。

三、古蜀宇宙观与“亚美文化连续圈”

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 Strauss)曾经发现,商代的表现手段与印第安人、西伯利亚,甚至新西兰的原始艺术极为相似^[19]。张光直先生认为,东亚、北亚、中美洲古代艺术的许多基本风格和内容相似的原因是它们都来自于一个共同的旧石器时代底层。他也将这个连续体称为“玛雅—中国连续体”。10000多年之前,美洲、北亚和东亚后世文化的创造者具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因此共同分享了共同的宗教原型和宇宙观思想^[20]。按照这一观点,宇宙是一个十字形的结构就不是古代中国所独有的思想,不但东亚的中原文化相信十字形的宇宙,而且北亚、美

洲居民也都分享了这一古老的信仰。因此,古蜀人具有十字形的宇宙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光直先生认为,这种十字形的宇宙图式不仅仅分布在东亚,这一图形是被包括了古代中美洲文明的整个“亚美文化连续圈”所共同分享的宇宙格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二者在一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共同拥有的那一个“文化底层”。通过对墨西哥奥尔梅克文化(Olmec)十字形宇宙图形的分析,他认为一个四方形的空间在缺失了四角之后呈现的就是这样的图式,春秋时代宗庙四角各有一“玷”,也呈现出亚字形的结构。殷代的“亚字形”表现的可能就是缺失或凹陷了四角而形成的神圣空间格局^[21]。张光直先生的这一观点与于省吾先生的思路也颇为接近,于省吾先生引用了纳西族象形文字中“角落”一词即被表现为缺失的四角,

因此推测商代的“亚”字即“象隅角之形”^[22]。从这一材料可知,西南的纳西族也具有缺失了四角的十字形观念,这也就不难理解位于西南的古蜀文化中为何也具有十字形宇宙图式的原因了。

实际上,这种带有神圣意味的十字形符号确实具有较为久远的历史存在。早在距今6500~6000年前的湖南安乡汤家岗大溪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白陶盘底部就有十字纹。在青海柳湾马家窑、马厂期的器物中,共有116件上画有十字形的符号。这样的例子在湖北屈家岭文化等遗址中也多有发现。吴锐先生认为,这种史前的十字形符号与四方空间的精神世界建构有关^[23]。这些史前广泛存在的十字形符号表明,古蜀和殷商时代宇宙观结构的十字形的确具有相当古老的精神谱系,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旧石器时代。

【参考文献】

- [1] 米尔恰·伊利亚德著,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M].华夏出版社,2002.52.
- [2] [7] [14] Mircea Eliade, 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74, P154, P264-265.
- [3] 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M].中华书局,2007.396.
- [4] 段渝.先秦巴蜀的尚五观念[J].四川文物,1999,(5);段渝.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345-346.
- [5] 段渝.五尺道开通时代考[A].段渝主编.巴蜀文化研究集刊: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2[C].巴蜀书社,2012.43-44.
- [6] 左传·成公十三年[M].
- [8]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90.
- [9] 容庚编.金文编[M].科学出版社,1959.827-832.
- [10] 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A].观堂集林·上册[C].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83.
- [11] 艾兰著,汪涛译.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99,115.
- [12] 米尔恰·伊利亚德著,晏可佳,吴晓群,姚蓓琴译.宗教思想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469.
- [13] 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西文化的趋同与差异[M].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36-52.
- [15]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M].中华书局,1985.57.
- [16]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80.
- [17] 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82-84.
- [18]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63,注释.
- [19]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著,陆晓禾,黄锡光等译.结构人类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85-92.
- [20] 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底层[A].中国考古学论文集[C].三联书店,1999.363-364.
- [21]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M].三联书店,1990.89-94.
- [22] 于省吾.释亚[A].甲骨文字释林[C].中华书局,2009.361.
- [23] 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一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316-334.

(责任编辑 邹一清)